

## 從中共外交基本原則看趙紫陽訪歐之行

張

虎

以中共總理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歐洲訪問團一行於五月二十九日離平，次日抵達法國巴黎。經過十八天的時間，先後訪問了代表歐洲十個國家的歐洲共同體總部，及法國、比利時、瑞典、丹麥、挪威、意大利等六國，已於六月十六日經由南寧返回北平。趙某此行的意義何在？本文擬先就中共的戰略和策略理論，綜合出八項基本原則，然後就中共當前外交政策的演變加以簡析，藉以證明此八項原則可以適用於中共的外交政策，進而再敘述這次趙紫陽歐洲之行的經過，以與此八項原則相印證。

### 一、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他的意識形態是主義，而中共過去和現在的「首要」也都未曾稱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為主義，倒是西方學者在寫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時稱之為毛澤東主義 (Maoism)。綜合中共的一切資料，迄今中共仍然還是一律稱馬克思列寧的意識形態為主義，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自己也認為他的思想與馬克思列寧的主義有理論與實際之別。毛澤東會說：「我們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作死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sup>①</sup>。換言之，所謂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主要是一

註①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三卷第八一七頁。

些「理論與實際」結合的作法<sup>②</sup>。這些作法雖然由毛澤東思維而來，但是不能算是理論與學說<sup>③</sup>，只能算是一種戰略與策略的設計。而其戰略與策略的思想根源主要還是來自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毛澤東並無什麼新的創見。

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思想主要來自所謂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理論。儘管中共的戰略與策略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表現出階段性，但是其所根據的馬列主義理論不變，過去如此，今天如此，將來亦復如此。

何謂戰略？策略與戰略如何區別？姚孟軒先生根據共黨的理論加以分析，認為戰略是以綱領所規定的政治目標為「工作指南」，策定「組織能夠最迅速地獲得最大效果的決定性打擊的計劃」，「支配」無產階級運動這一目標。可見戰略來自綱領，以綱領的目標為目標，並為達到這個目標確定基本打擊方向（主要敵人）、基本力量（依靠力量）和後備力量（同盟軍）。什麼是綱領？過去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得出「資產階級必然崩潰，無產階級必然奪得政權，資本主義必然由社會主義代替」三個結論。今天鄧小平仍循馬克思的結論，提出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原則（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所謂的戰略綱領。由於這個綱領的實現需要龐大的世界革命工程，不是短時期所能完成，因此，必須分期實施，於是便有了戰略的階段性。每一階段也有每一階段的領導綱領，每一階段有每一階段的政治目標，每一階段有每一階段的戰略計劃<sup>④</sup>。

何謂策略？策略是在各戰略階段，順應工作環境的順逆和敵我力量的消長轉化，為執行戰略計劃，實現戰略目標所擇定的行動路線。策略只講實用，根據現實情況，在戰略所規定的範圍內決定聯合的具體對象，以及爭取的可行方法。毛澤東認為統一线是一種策略<sup>⑤</sup>。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所以統一戰線的理論亦適用於外交策略之上。

根據以上有關戰略和策略的理論，可以綜合出中共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為下列八項：

(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外交政策的總綱領，各階段的外交政策在總綱領的規定下決定於各時期中共對內對外客觀形勢的認識。

(二)各階段的主要敵人（打擊對象）取決於各時期國際關係中敵我對抗性的主要國際矛盾；次要敵人（聯合對象）屬於可以直接或間接增加對抗主要敵人的力量的國家以及可以直接或間接削弱主要敵人力量力的國家。

註② 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臺北，帕米爾書局，民國五九年六月再版），第二〇至二三頁。

註③ 同註②，第四八七頁。

註④ 姚孟軒：「中共怎樣處理國共關係」，〈國共關係簡史〉（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二年出版）第二至四頁。

註⑤ 同註④，第二、五頁。

- (三) 發展進步勢力（第三世界），爭取中間勢力（第二世界），反對頑固勢力（第一世界）。
- (四) 爭取多數（第二和第三世界）反對少數（第一世界），各個擊破。
- (五) 強硬而不致於決裂，軟弱而不致於喪失立場。
- (六) 中共沒有長久不變的外交政策，中共的外交政策只是一種按照「國際」和「國內」情況發展而不斷調整的辦法。
- (七) 中共的國際行爲，在其外交政策的規定之下作靈活而彈性的運用。
- (八) 在階段上，一個國家如果對中共沒有直接安全威脅，中共不會以意識形態或其他類似原因而採取策略上的敵對態度<sup>⑥</sup>。

## 二、當前中共外交政策之演變

前已述及，中共的戰略有綱領性；戰略綱領雖然不變，但是爲了適應客觀環境的改變而每一階段都有每一階段的戰略特性。一九七九年中共基於安全上的原因，爲了聯美制俄而與美國「建交」。但是不久，中共當局似已發現這一階段的外交政策犯有以三個錯誤：第一、此種政策作了影響安全的不必要讓步；第二、此種政策爲爭取經濟建設時間而故意粉飾太平，然而事實上並未換取到時間，而所掩飾的問題又極重要；第三、以夷制夷政策要仰仗外國力量，不切實際<sup>⑦</sup>。因此，到了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共便開始通盤檢討其全面的外交政策。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重提「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來往」，暗示中共爲適應其階段環境的需要即將改變其聯美制俄的外交政策（請參考前述「原則（一）」）。這些跡象可以從以下的中共資料中窺知。

一九八三年，中共的「國際問題研究」在「更加緊張動盪的一年」一文中分析國際情勢時說：

「展望一九八三年，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狀況還將繼續。有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雖有可能停止，但是回升的幅度不會大，仍將是『滯脹』局面。蘇聯東歐等國家的經濟改革不會有太多進展，增長率下降、外匯拮据等困難還可能進一步加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將陷入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但有些國家的情況可能得到改善。在國際關係中，一九八二年的許多矛盾，一九八三年將繼續存在，有些還會發展和激化，也不能排除出現新的地區性衝突的可能性。整個世界形勢仍將是緊張動盪的。美蘇兩霸

註⑥ 請參見 J.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54-62.

註⑦ 朱新民：「中共『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剖析」，〔匪情月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七三年五月）第二六卷第一期第六七頁。

將繼續加緊爭奪，但它們面臨的困難是無法克服的，困難程度還可能超過一九八二年。兩國領導的地位都將有所減弱」<sup>⑧</sup>。

一九八三年「北京周報」在評估世界經濟情勢時說：美國的國民總生產如果與世界國民總生產相比，已從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廿六·七下降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廿四·四；蘇聯的國民總生產從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三·二下降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九·八；而同一時期，西歐、日本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民總生產與世界國民總生產相比，西歐從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廿五·七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廿八·二；日本從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七·四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六；第三世界國家則從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四·二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四·七。不僅如此，到了一九九〇年，美國國民總生產還會進一步下降到百分之廿二；蘇聯下降到百分之八；而西歐則將上升到百分之廿八；日本將上升到百分之十三；第三世界國家將上升到百分之十六<sup>⑨</sup>。

一九八三年的「世界知識」在「國際形勢的變化與發展趨勢」一文中說：

「雖然從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中，研判它們的地位不致發生基本的變化，不過，衡量它們對世界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却在逐漸減退中，而且世界越來越走向多元化的方向，這就是在這個世紀的最後的十年至二十年之間，國際政治結構變化的基本的側面」<sup>⑩</sup>。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中共「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目為「維護世界和平必須反對霸權主義」的文章中已把中共外交政策的取向說明白：

「擁護世界和平和反對霸權主義，兩者是具有表裏一致不可分離的關係。今天的世界裏只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地主義，才是威脅各國獨立和安全的主要勢力，而且威脅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就是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假若不去反對霸權主義，而允許霸權主義橫行時，那麼所謂擁護世界和平，祇不過是徒作呻吟而已」<sup>⑪</sup>。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已從一九七九年的聯美制俄政策開始轉向其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美蘇保持對等的距離。一九八二年九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已公開地說「中國（共）決不依靠任何大國或任何國家集團，我們並且以實際的行動向全世界顯示出，我們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至此中共已標明要走第三世界的外交路線，胡耀邦又說：「中國

註⑧ 李凝「更加緊張動盪的一年」，《國際問題研究》（天津出版）第七期（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一〇頁。

註⑨ "Beijing Review", No. 19, (May 9, 1983), p. 19.

註⑩ 宋河：「國際形勢的變化與發展趨勢」，《世界知識》（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

註⑪ 「維護世界和平必須反對霸權主義」，《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共）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共）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鬭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

但是中共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的中心任務是「現代化」。儘管中共如何堅決地與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反對第一世界的霸權主義和第二世界的殖民主義，而其「現代化」所需的資金和科技却又非向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伸手不成。中共從其與美國「建交」以來的過程中已得知美國不可能全力助其「現代化」，而其對蘇俄的援助又心有餘悸，因此，中共標榜「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真正意義是，不反美也不反蘇，聯合第三世界，利用第二世界，在暫時安定的國際環境下，向第一和第二世界謀求經濟和科技上的利益。換言之，當前中共的外交政策正如其對內政策一樣，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經濟上聯合第一和第二世界，政治上聯合第三世界。（請參考前述「原則（一）、（六）、（七）、（八）」）

### 三、趙紫陽訪歐經過

趙紫陽今（一九八四）年五月底和六月初的歐洲之行，從其主要活動和言行來看，表面上給人的印象好像是為了「現代化」的經濟目的。但是如果不從中共的戰略和策略理論以及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的本質來看，自然無從了解問題背後的問題。

綜合趙紫陽此次在歐洲六國的訪問活動可以看出其訪問目的大致可分為三方面：第一、趙紫陽剛於五月上旬在中共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發表「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對外開放政策，旋即展開歐洲的訪問，其目的無非是向西歐科技先進國家表示經濟合作的意願，藉機向西歐各國爭取「四化」資金。第二、趙紫陽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一反往例，其中外交部份的內容佔據全篇的二分之一，因此，趙紫陽此次歐洲之行的第二個目的無非是想闡揚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共在與美日來往之際並未忽視西歐國家的價值，並趁機藉美俄在歐洲的核子軍備競賽，分化西歐國家與美國的團結，破壞東歐國家與蘇聯的關係，藉以增加其對歐洲國家的影響力量。第三、趙紫陽在中共六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談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因此香港問題不僅成爲六屆「人大」和「政協」的熱門話題，亦成爲趙紫陽此次歐洲之行的重要話題，並且每到一處就借題發揮，大談所謂「臺灣問題」，其目的無非在企圖進一步孤立我中華民國，破壞中華民國與西歐國家進一步發展實質關係。

然而，趙紫陽的歐洲之行，主要還是爲了經濟目的。因爲趙紫陽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每到一處都必然會重複地說明中共已經開放了大門，而且將會愈開愈大，永遠不會再關上；爲此將不斷完善經濟法規，提高工作效率，以利擴大合作<sup>②</sup>。此外趙紫陽還

註② 「趙紫陽在歐洲宣揚開放政策」，香港《大公報》社論（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

親自參觀了西歐國家多處能源、交通、電子通訊以及農場、工礦企業等設施，並介紹了中共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需求。但是趙紫陽此行在實際經濟利益上並未獲得太多的成就。除了分別與法國簽署了保護投資及避免雙重徵稅協定，與比利時簽署了投資保護協議等有實質性成果的協定和協議外，其他都是一些鼓勵西歐各國企業界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會談和協商<sup>⑮</sup>。

在外交活動上，趙紫陽所到之處都要安排同各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和政治磋商，就雙方共同關切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此外，趙紫陽也同各國政要和各國議會議長、黨派領袖作了「友好」會晤。在趙紫陽訪問歐洲的過程中最突出的政治表演就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法國國民會議大廳發表的題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演說，以及他於六月七日在斯德哥爾摩和五月九日在哥本哈根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與各國政治首要會談時幾乎都不超出這次演講和兩次記者會的內容。

趙紫陽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演說中首先說明此行訪歐的目的有三：「加強友好合作，發展經濟交流，促進世界和平」。在談到當前歐洲局勢時趙紫陽說：「當代的歐洲在世界範圍內是軍隊、常規武器和核武器最為集中的大陸。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超級大國在這一地區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軍備競賽，又在不斷升級。這是當前歐洲局勢更趨緊張的根本原因。」在談到中共對歐洲局勢的立場時說：「我們認為，歐洲各國的獨立和主權應當得到尊重，安全應當得到保障。我們讚賞西歐國家爲此而推進聯合的努力，我們也願意看到美國、蘇聯緩和關係，因爲這些都有利於歐洲和世界和平。」在談到中共和西歐國家合作關係時他說：「我們堅信，一個奉行獨立自主政策的中國（共）同一個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歐洲之間進一步加強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將對緩和國際局勢、維護世界和平的崇高事業，做出重大貢獻」<sup>⑯</sup>。

趙紫陽每到一處都不忘記舉行記者招待會，利用香港問題大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六月七日，趙紫陽在斯德哥爾摩的記者會上，當記者問到中共是否放棄用武力來收回臺灣時，趙紫陽說：「中國（共）力爭用和平手段解決臺灣統一問題，這符合臺灣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願望。但是，中國（共）決不能承諾不使用武力。因爲中國（共）越是做出承諾不使用武力，最後可能被迫使用武力」<sup>⑰</sup>。

六月九日，在哥本哈根的記者會上，當記者問到香港問題的解決是否會對臺灣「回歸」樹立一個榜樣時，趙紫陽說：「中國（共）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之後，將採取的政策，我想大家都已清楚，在這裏我就不多說了。我們對臺灣的政策，也是衆所周

註⑮ 黃錫豪：「中國與西歐合作的新里程」，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

註⑯ 「巴黎航訊」：「趙紫陽在法議會重要演說」，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註⑰ 「在斯德哥爾摩回答記者問」，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知的。記者先生提這個問題，好像是說，臺灣問題一定要放在一九九七年後才能解決。我們沒有這個看法」<sup>⑯</sup>。

#### 四、結 論

如果從中共對外所表現出來有關「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來看此次趙紫陽的歐洲之行，很容易誤認趙紫陽此行的目的純粹是爲了經濟。但是如果從中共一貫所使用的戰略戰術理論，再透過中共當前外交政策的本質來看趙紫陽歐洲之行，可以發現，趙紫陽的歐洲之行並非純爲了經濟目的，其在歐的一切言行亦均不脫中共戰略戰術的理論和當前外交政策的範疇。

第一、中共絕不會因爲追求經濟利益而放棄意識形態的政治綱領。由於近年來中共多變的彈性外交，再加以中共極力追求「現代化」建設，不少西方學者認爲中共今天已變得非常務實，不再死抱著意識形態的牌位不放。中共當局爲了迎合西方世界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不僅做出一種對西方經濟和科技非常飢渴的姿態，還在雷根訪問北平時由趙紫陽以非正式方式公開說：「我認爲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會看到這麼一點：現在再有意識形態來劃分一個國家是友好的或敵對的，已是不適當的了」<sup>⑰</sup>。言下之意似乎中共已放棄意識形態。這次趙紫陽歐洲六國之行，以一種拼命追求西方資金與科技的姿態出現，更難免加深了持這種看法的西方學者的信念。

其實，中共只是爲了階段性的特殊需要而降低或不再強調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表示已放棄意識形態。胡耀邦在「十二大」談到中共外交政策時說：「中國（共）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爲基礎」，此外，在中共的重要文件中都可以發現，中共並沒有放棄意識形態。這次趙紫陽訪問歐洲，雖然是以一種經濟的姿態出現，他仍沒有放棄意識形態，所不同的是他技巧地不突出意識形態。只要有適當機會，他還是不會忘記加以說明。例如在哥本哈根，趙紫陽公開說：「爲了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爲了使我們國家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我們在加強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sup>⑱</sup>。所謂精神文明建設，當然是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中共外交戰略和戰術的總綱領，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絕不會放棄。（請參考本文前述「原則（一）」）。

第二、現階段中共外交政策係根據前述「原則（二）、（四）」的理論，把世界仍然區分爲三。美蘇爲第一世界，西歐國家和日本爲

註⑯ 「在哥本哈根答記者問」，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一〇日）。

註⑰ 「趙紫陽盼美拿出行動」，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八日）。

註⑱ 「趙紫陽談經濟特區政策」，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

第二世界，其他開發中和未開發國家為第三世界。雖然自從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共根據其對國際局勢發展的認識，認為美蘇對其威脅減輕，而趨於主張「獨立自主」，與美蘇保持等距離的外交關係，藉以維持一個暫時和平的局面，以便進行其「現代化」建設；但是基本上仍視美蘇為主要敵人。根據「三個世界」的理論，中共在國際統戰上所依靠的雖然是第三世界國家，所要聯合的却是第二世界國家。這就是為何趙紫陽在訪歐過程中一再指責美蘇在歐洲的核軍備競賽對歐洲國家所造成的安全威脅，進而向歐洲國家呼籲，希望歐洲國家擺脫美蘇的控制，與奉行獨立自主政策的中共合作，反對霸權主義，為「緩和國際局勢，維護世界和平的崇高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總而言之，趙紫陽歐洲之行的戰略意義，仍不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理論範圍。

第三、根據前述中共的「原則(一)、(六)」，一個國家如果對中共沒有直接安全威脅，而且能直接或間接增加現實利益，中共不會以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採取敵對的態度。中共和西歐國家的關係，除了英國和法國在亞洲有與中共利害衝突的可能外，其他各國在亞洲不僅沒有深遠的歷史關係，亦無重大政治和經濟利益。相反地，西歐國家除了在思想意識上與中共不同外，在經濟上却是中共的第二個貿易「伙伴」。據中共的統計在最近九年來，雙邊貿易額增加一·四倍，一九八三年的總額達六十八億美元，而一九七五年只有二十八億美元。中共從西歐的進口總額，一九八三年已達四十二億美元，而一九七五年只有十八億一千萬美元，增加了一·三倍。去年的貿易額，就比前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九，這個增長率比中共對美、日的貿易增長率還高<sup>⑩</sup>。由此可見，趙紫陽這次歐洲之行，雖然不能忘記意識形態和從事反霸的宣傳，經濟上的需求也是此行的重要動機。更何況還可以藉其與歐洲的經濟關係向美日表示中共可以不完全依靠美日，藉以要挾美日在其他利益上向中共妥協。

第四、中共當前的外交政策是以美蘇為主要敵人，但是由於一九八一年以後，中共認為來自美蘇的安全威脅已告減輕，但是中華民國對其安全的威脅仍然存在。而且由於中華民國的政治影響深入中國大陸，益使中共政權感受威脅。因此，近年來中共的安全重點放在中華民國。不僅在中共與美國關係上中共要設法打擊中華民國，在其與西歐的關係上亦不例外。這就是為何趙紫陽在歐洲每到一處都不忘記大談香港問題，並借題發揮，強調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有可能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趙紫陽此舉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把西歐國家拉緊，避免西歐國家與中華民國加強實質關係，企圖進一步孤立中華民國；另一方面則暗示，臺灣局勢不穩，中共隨時有武力犯臺可能，藉以嚇阻西歐國家以及其他自由世界國家與中華民國發展實質關係。

註⑩ 「趙紫陽訪歐具有新意義」，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副研究員）